



用思想

魏勇◎著

点燃课堂

——特级历史教师魏勇教育教学

下

魏勇

特级教师，重庆市重点中学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得主，区科技拔尖人才，《世界历史》教参编委，中央教科所教师培训中心专家组成员，国家审定通过的川教版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人员，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兼职教授，70多篇论文，2本论著，全国各省市几十堂观摩课和讲座。

极具才情的理想主义者、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为文尖锐，为人亲和。



中国教育名家 教师教学指导丛书

ZHONGGUO JIAOYU MINGJIA

用思想

魏勇◎著

点燃课堂

——特级历史教师魏勇教育教学

下



魏勇

特级教师，重庆市重点中学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一等奖得主，区科技拔尖人才，《世界历史》教参编委，中央教科所教师培训中心专家组成员，国家审定通过的川教版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人员，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兼职教授，70多篇论文，2本论著，全国各省市几十堂观摩课和讲座。

极具才情的理想主义者，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为文尖锐，为人亲和。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思想点燃课堂:特级历史教师魏勇教育教学(下)/
魏勇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407 - 4955 - 2

I. ①用… II. ①魏… III. ①历史课 - 教案(教育)
- 中学 IV. ①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877 号

用思想点燃课堂——特级历史教师魏能教育教学(下)

作 者 魏 勇
责任编辑 文龙王 周群芳
封面设计 揽胜视觉
责任校对 周群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杜 森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 - 2583322 010 - 85893190
传 真 0773 - 2582200 010 - 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 - 2583322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7 - 4955 - 2
定 价 42.00 元(上下)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中学生常识讲座二：国家等于政府吗

大家都知道，二战时期的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在北非沙漠上，他常常以少胜多，在阿拉曼战役以前，他几乎都取得了胜利。他的战功为他赢得了显赫的荣誉，1942 年被希特勒授予元帅衔，成为了第三帝国最年轻的元帅。他的军事天才是如此的出众，甚至于受到了敌人的赞扬，丘吉尔评价隆美尔说：“尽管我们在战争浩劫中相互厮杀，请准许我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但这位“伟大的将军”却在 1944 年因“叛国罪”被希特勒下令处决。一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怎么可能背叛国家呢？原来，希特勒认为他参加了 1944 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于是以“叛国罪”为名，迫使他自杀。

国家等于政权吗

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国家，这是希特勒给隆美尔罗织叛国罪的一个隐性前提。在这里，国家、政府和领袖，三者之间被画上了等号，希特勒的逻辑是，背叛领袖就等于背叛政府，背叛政府就等于背叛国家，所以隆美尔背叛了国家。然而，历史是公正的，背叛希特勒的那些人今天被看做爱国者，因为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德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创伤。为了满足纳粹政权的扩张欲望，德国在二战中一共付出了死亡 900 多万人的代价，还不说领土、财产的损失。

当年的叛国者，今天的爱国者，这个变化表面上看是因为德国战败、纳粹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德国人从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中清醒过来后，对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的结果。德国不等于纳粹政府，更不等于希特勒，所以，背叛纳粹政府不等于背叛德国，恰恰相反，由于纳粹实行暴政，对这个政府的背叛其实是最好的爱国方式。

的确，有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是搅和在一起的。当政府在行使对外交往的职能时，政府代表了国家，比如：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是和一个在美国这

块领土上行使政治职能的政权建交，同样，美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交。在英语里面政权意义的美国和民族意义的美国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The United States”，后者是“America”。大家注意看《新闻联播》，在外交场合，美方代表桌子上的牌儿，写的是“U. S.”，那是“The United States”的缩写。如果你问一个游客是哪国人，他会回答“American”。在美国人那里，“美国”的不同含义用不同的单词来表现，是清清楚楚的，而在中国，国家、政权、民族等所有含义都放在了“中国”一个词里，非常容易混淆。

什么是国家

在汉语里面，我们仔细琢磨，就能发现“国”这个字含义是复杂的。比如：国产、国际、国情、国界、国耻、国画、国语等等，这里面的“国”指的是国家。而在另一些汉语词汇里，“国”指的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或者政权，比如“国庆”，在1949年前，国庆指的是10月10号，即武昌起义爆发的日子；现在的国庆则是10月1号。显然，这两个国庆中的“国”有不同政治内涵，前者指中华民国政权，后者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所以，与其说国庆节是国家的生日，不如说是新政权诞生的日子。指代政府和政权的“国”在汉语里还有许多，比如，国旗、国歌、国企、建国、国有等等。所有这些词汇混在一起大量使用，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国家和政府这两个概念严重混淆。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这不正好说明政府等于国家的吗？好的，让我们来看看国家和政府有什么区别。首先，什么是国家？国家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人民、领土、主权。而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以我们班为例，如果我们班好比是一个国家，那么班委会就好比是政府，它是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这个班委是怎么产生的呢？大家民主推选的，政府的产生也应该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就是卢梭所说契约的产物。

之所以需要政府，按照霍布斯的说法，“在没有一个强大权力使大家畏服的地方，人与人处于战争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府扮演强有力的仲裁者角色，社会就会混乱，所以，我们通过每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的方式产生一个政府，使其为我们每个人服务。这表明在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国家是目的，政府是手段，国家大于政府。执政者不是国家，不是公共权力本身，而只是它在一定时期内的执行者，或最多是代表。

廉价爱国只会误国

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汉语语言模糊性，自古以来，我们就不习惯作这样的区分，我们习惯了把朝廷与国家混在一块儿，就是梁启超所批评的“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古汉语里面，我们更多地使用“江山”“社稷”“天下”这些象征领土的词来替代“有限政权”，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在“忠君等于爱国”的旗帜下。偶尔使用“国家”一词，也是从家天下的角度来使用。

由于汉语里类似于把朝廷等同于国家，或者把政府等同于国家的用法普遍存在，所以，一说爱国，人们想到的就是爱政府；一说反对政府，人们想到的就是卖国。在这样幼稚的思维方式中，产生了许多廉价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把本国那些有勇气和良知揭露黑暗、说出真相的人谩骂为卖国贼。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着专制力量的奴才，像是奥威尔《动物庄园》中那些没有个体意义的鸡鸭牛羊们，“台上讲话的是谁，他们就支持谁”，为显示自己的忠诚和爱国，他们今天为别国的恐怖主义灾难叫好，明天为轰平台湾喝彩。之所以说他们廉价，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确保自己的爱国表演没有任何危险。其实，那些自己不敢批评监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压制批评的人，非但不是什么爱国者，而且是国家的蛀虫。

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政府是人们德行软弱的产物，如果人人高尚，都能够自律，那就不需要政府了。为了限制人们的恶，于是人们理智地制造了政府出来管理。问题是政府一旦有了人们授予的权力，它又有可能滥用权力，政府也是人组成的，也有人的缺陷，就像孟德斯鸠指出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所以，反过来人们又要想办法来制约政府，怎样制约？一靠权力制约权力，二靠舆论监督。所以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永远是必要的，批到什么程度？要让政府怕人民，而不是人民怕政府的程度。为什么呢？《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说得很好，“当政府怕人民的时候，人民就有自由；当人民怕政府的时候，就是专制”。

他们信奉限权政府而非全能政府。联邦党人认为，暴政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是政府过于强大，因此，限制政府，特别是限制高高在上、民众的眼睛无法直接监视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就成为美国宪法制订的一项基本原则。读美国宪法，有时你会感到，与其说它是在授权政府可以做什么，还不如说它是在规定不允许政府做什么。因为在内心深处有着对政府这个“必要的恶”

的高度警惕。“必要的恶”的提法，是美国学者盖瑞·威尔斯最近出的一本书《必要之恶》所谈到的，讲的就是美国人不相信政府的历史传统。

正因为美国人一直不大相信政府，所以他们老是担心政府干坏事，于是老是敲打政府。2005年的普利策摄影奖作品一共20幅，没有一幅是歌颂美国政府的，几乎全是反映伊拉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像《武装分子袭击选举工作者》、《反美武装的还击》、《大桥上的尸体》、《悼念死去的士兵》等，矛头直指布什政府。

美国人对强政府的担心恰和中国人对强政府的渴望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打压欺辱，而在民众看来，最直接和表面的原因是政府的软弱无能，于是，建立强大政府以御外辱，成为民众和民族的基本诉求。所以，在国人潜意识当中，政府变成为救世主，成为了一切问题的解决终结者。

殊不知，强大的政府即可以御敌，也可以制民，特别是在缺少对这一政府必要制约的时候和场合。苏联为什么能够进行“大清洗”，纳粹为什么能够轻易迫害犹太人，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政府太强大，没有什么能约束它。《国际歌》有句歌词唱得好，“从来就没有神仙和救世主”，人民不能把自己的福祉寄托在政府身上，那样做是很可笑的。试想，主人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仆人身上，那岂非颠倒了主仆关系？

事实上，政府存在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人民谋幸福，而应是为人民谋幸福创造机会。又以我们班集体为例子，我们班委存在的价值在哪里？是协助老师为全班同学学习进步创造一个优良的班风环境，这是班委最大的使命，而并不需要班干部亲自去帮助同学提高分数。当然，有同学向你请教问题，你也应该认真解答，就像老百姓向干部求援，干部也应该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一样。不过，这是次要责任。

总之，我们只有把国家和政府区分得像水和油一样，我们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真正的爱国者敢于发出强烈的自我否定的声音，有勇气承受所谓“卖国”、“叛国”的责难。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恰达耶夫如此表述他的爱国理念：“爱祖国——这是壮丽的事情，然而还有更壮丽的事情，那就是爱真理……我并不要学会带着闭上的眼睛、崇拜的大脑、封上的嘴巴去爱祖国。”我们每个同学都要想一想，你抒发对祖国的热爱时，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大脑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中学生常识讲座三：中国比日本差在哪里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 世纪中叶，有个美国人叫佩里，他率领四艘蒸汽铁甲舰侵略了一个东方国家，迫使这个国家开放通商口岸，签订了不平等的《安政条约》，美国在这个国家享有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从此，这个国家遭殃了，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至，也强迫这个国家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一个故事的两个结局

故事到这里并不奇怪，无非是一场鸦片战争的翻版，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不但不仇恨他的敌人，反而为他的敌人树碑立传。这个国家在当年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当年由佩里率领的黑船登陆的地点，竖立了一座佩里登陆纪念碑，上有前首相伊藤博文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在佩里公园里，每年都有由民间组织的开国纪念活动，人称“黑船祭”。在纪念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以英雄的姿态出现。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在遭受了侵略之后，日本和中国所作出的反应截然相反。日本人的做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丢人到家了，别人欺负了你，你还要感谢人家。用中国话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道侵略有功吗？

19 世纪中叶，我们中国也遭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我们也有纪念，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我们修建了鸦片战争博物馆，陈列了一批抗英时用过的大炮、炮弹、火药缸、大刀、长矛及当年缴获英军的洋枪、洋炮等。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纪念的是自己的英勇斗争，通过牢记敌人犯下的滔天罪恶达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面对挑战，看来中日两国的区别在于，中国式纪念活动是进行情感教育，而日本式的纪念活动则体现为理性的自负。

于是，中国在排外和羡慕外国的矛盾心情中挣扎了一个多世纪，至今步履蹒跚；而日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西方文化的怀抱，迅速崛起为亚洲第一强

国。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坐不住了，难道我们就不要民族气节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丧失了民族气节，这个国家都不可能强盛。民族气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驱动力。不过，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民族气节。我认为，应该抗争的时候抗争，固然是民族气节的体现，而应当妥协的时候妥协，不等于没有民族气节，这是一种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的爱国体现。在对外关系上，不分场合地一味强硬，我认为不是气节的表现，而是愚蠢的表现。

事实上，民族气节有表面和深刻之分。体现在表面上的气节，以自我褒扬和坚决排外为特点，气节在骨子里，以自我反省和虚心向敌人学习为特点。

说到这里，我要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在日常交流中，大家不要用“××鬼子”来称呼别人，要好好说话。那种蔑称，不但不能提升我们的形象，反而显得我们虚骄，更让人瞧不起。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战胜了别人，那时，你再使用这个称呼也不迟。我们要有强者的国民心态，而不要像我们的阿Q祖先那样。

虚骄和虚心，两个词只有一字之差，但表现出的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国民心态。前者是弱者心态，后者是强者心态。中国和日本的差距首先体现在心态上。

怎样才算对民族负责

吉田茂执政时期的日本几乎被迫接受了占领军颁布的一切法令，包括宪法。现在的日本宪法，还是当年麦克阿瑟制定的。尤其过分的是吉田茂签署了《日美安保协议》，协议第六条赋予了美国在日本永久的驻军权。这个协议一签署，就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批评者们说，它会把日本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殖民地。吉田茂是怎么回答这个指责的呢？他公开声称日本变成了殖民地对日本发展有好处，他说：“正像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但现在比英国更强大一样，如果日本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最后也会变得比美国强大。”（高曾杰主编：《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173页）在1960年重新修订这项政策时爆发的骚乱，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取消了对日本的访问。这一条约尽管受到批评，但现在日本人认为，这个协议对日本发展成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是典型的卖国贼。他的卖国行为还有很多，比如，他跟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打得火热，完全成了美军的傀儡，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就是，“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由于日本是如此地崇尚美国，以至于当1951年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吉田茂感激涕

零，他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这样称赞一个占领他们国家领土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的利益而作出的成就，是历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之一。毋庸置疑，他受到了我国全体人民最深切的景仰和爱戴。在他离开我们国家之际，没有任何言辞足以表达我们国家对他的敬意。正是他，把我们国家从投降后的混乱和疲惫中拯救了出来；正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角落撒下了民主的种子。”（《领袖们》尼克松）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处于被占领状态，我国人民的反应会是什么？有这样几种可能性：爱国者们陷入到长期的仇恨当中，持续抵抗，他们无法清醒地认识敌人的长处，更不可能以学生的心态，以敌为师；大多数想过太平日子的一般民众则可能成为没有思想的顺民；还有一部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和敌人合作，从而获得个人的荣华富贵，成为不折不扣的汉奸。很少人会立足于自我发展，虚心向敌人学习，以便最终一雪国耻。

日本人是怎样做到的

如果我们再了解一下，日本以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对待美国的心理背景，相信我们会更加震撼。整个二战，日军死亡212万人左右，其中死于中国战场50万左右，这意味着日军死亡人数将近75%是美军造成的，日本平民死亡67万，几乎全是死于美军轰炸。照理来说，日本人应该十分仇恨美国人，所以，当时很多人预料，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遭到日本人激烈的抵抗，尤其考虑到战争末期，日本“神风特攻队”的出现，这种可能性会很大。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没有抵抗，没有打游击战。当麦克阿瑟进入东京时，只带了几个随从，并且没带武器，而当时，东京还有20多万日军全副武装，不过，没有一个人向“侵略者”打冷枪。愿赌服输，这是日本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把内心的愤懑转化成了日后重新建设国家的动力和向对手学习的渴望，所以在吉田茂执政的短短七年时间，日本重新以经济大国的形象站立起来，在经济上超过了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后来再没有人说吉田茂卖国，从1957年到1972年，他的继承者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继续执行了他的政策，以至于人们把后来的这些日本首相看做是“吉田学校”毕业的人。

像日本这样一个从“即使只有竹竿也要抵抗到底”的态度突然变为与占领者密切合作改革内政的国家，全世界除了日本，大概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如此极端的国家。或许正是具备了如此迅速转弯的能力，才使日本能够在战后迅速崛起。这种转弯的能力，多次帮助日本抓住了发展机遇，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中非常得意地作了这样的总结：“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遭到惨败，可是整体看来，日本还是在国际政治的变幻莫测中巧妙地把握了自己的方向，

这是日本人聪明的地方，尤其是明治时期的政治领导者都具有卓越的‘机智’。它应该一直受到提倡，日本民族永远不可以放弃这种‘机智’。”

这种“聪明”和“机智”，在我们看来，几乎就是汉奸和卖国贼的同义词，但在武士道的信条中，吉田茂的做法，不但不受谴责，而且应该褒扬。武士道的信条是“智”、“忍”、“勇”，不能忍，就不配做武士。当年德川家康身处于两大强敌——织田信长和武田信玄的夹缝当中，全靠一个“忍”字活下来，并最终灭掉了他们，所以，吉田茂附强的行为能够得到日本国民的理解。本来日本就有类似的传统。

以日本为镜子，我们看看今天伊拉克的抵抗斗争，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些新思考。若伊拉克人能够像日本人那样，迅速掉头向美国学习，伊拉克会是怎样的前景呢？个人觉得，前景应该比目前状况乐观得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今天伊拉克抵抗的不是美军的占领而是现代的文明，伊拉克抵抗者捍卫的不是民族的尊严而是落后的价值，抵抗时间越长，重建伊拉克工作的进展就越慢。支持伊拉克的所谓抵抗斗争，其实就是延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

听到这里可能很多同学又会产生道德上的困惑，抵抗入侵难道错了？我想，世界是复杂的，任何问题一旦绝对化都可能发生与我们初衷相反的结果。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把同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伊拉克作一个对比，我们是否能说经常使用人肉炸弹的伊拉克人比不抵抗的日本人更有尊严？

我们在哪里落后了

在认识世界时，我们常常被一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统治着我们的大脑，这些公理有：抵抗高尚，不抵抗卑下；自我赞扬高尚，赞扬敌人可耻；被迫接受敌人的条约可耻，不管这个条约是否对自己有利，都要想法废除等等，这些看起来大义凛然的公理，固然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绪，但同时也让中国人迷失在爱国情绪当中。自鸦片战争以来 160 多年的时间，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西方列强的看法上居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一直延续着与西方的对立多于同一、情绪大于理性的思维传统。今天我这个讲座还不能为大多数数人接受，就是一个证明。

之所以我们不如日本人虚心，源于我们内心不够诚实，无法做到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于是，用瞒和骗来回避我们自身的弱点。当被侵略时，我们就渲染敌人的残暴，而回避遭侵略的原因；当我们不得不承认落后时，就发扬一分为二的辩证风格，承认看得见的落后——物质落后，而不承认看不见的落后——精神落后；即使当我们必须承认物质落后时，我们也把原因归结于西方的侵略这样一个外部因素，今天我们的中

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坚持这个观点；当我们取得一分进步时，我们就用十分的热情来赞扬，而当我们面临十分的危机时，我们却往往用一分的注意来淡化；当有人批评我们发展得还不够快时，我们就用印度和非洲国家来作参照，以自我安慰，而拒绝与强国对比。

日本人则与我们相反，他们总是拿最先进的国家来与自己比。当他们在明治维新还刚刚起步时，他们的目标就是“脱亚入欧”，意思是不与亚洲国家为伍；当他们已经发展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时，他们还在渲染危机，总是挑自己的毛病，索尼公司的总裁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

所以，尽管现在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超过美国，达到了4万美元，但日本上下却充斥着危机意识。前不久他们重拍了一部唤起危机意识的电影《日本沉没》，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而我们人均收入才不过2000美元，却自认为已经进入“盛世”，我看，有这样的看法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进取心，被历史淘汰出局。我们是否会成为汤因比所说的第22种文明呢？值得每个人思考。

中学生常识讲座四：关于美国的几个误区

在我们的周围反美言论的声音是如此高亢，以至于有时我们会误认为，中美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昨天晚上，办公室里在闲聊伊朗核危机时，有位老师压抑着内心的愤懑，质问道：“美国的侵略怎么会说成人道主义战争呢？”是呀，阿富汗、伊拉克都没有邀请美国军队去他们的国家访问，难道这还不是侵略？今天我们这节课就来谈谈和美国有关的几个问题，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我们存在严重的常识错误。

一 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吗

十有八九，中国人会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且不说伊拉克石油丰富，单单是布什家族和石油的密切关系，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再有，美国国内的反战游行也打出了“NO WAR NO OIL”的标语，这一切充分说明了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可耻的石油战争。是这样的么？

我们先不要匆忙下结论，最好是先了解以下事实。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2003年以前，美国进口的石油总量中伊拉克石油只占8.5%（据伦敦和纽约设有办事处的专业能源咨询公司 Utilis Energy 对伊拉克石油领域所做的一份调研报告）。从2003~2006年，美国每年进口原油总量保持在2亿桶~2.5亿桶之间，折算下来，美国从伊拉克进口的原油每年约1700万桶~2000万桶，当时原油价格30美元左右一桶，总值最多为6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打伊拉克现在仅一个月的费用就高达84亿美元，据专家们估计，伊拉克战争最终所花的钱总价值在2万亿美元以上，这还不算美国人最看重的生命代价；另外，战争必然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从2003年年初时的30美元/桶升至2004年7月时的40美元/桶，现在的价格是60美元/桶左右，也就是说，由于战争的关系，为了购买石油，美国现在必须支付比战前高一倍的价格，美国一直是全世界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原油涨价后，美国是最大受害者，总计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在240亿美元~300亿美元之间。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那就意味着，美国人为了获得60多亿美元的石油控制权（注意，不是无偿获得），而花费20000多亿美元，同时要承受石油涨价后带来的负担，以及人员伤亡带来的舆论压力；也就意味着，美国人全是白痴！

显然，石油战争的说法十分荒诞。至于美国国内有人这样说，那是正常的，因为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什么观点都有。科罗拉多大学的丘吉尔教授公开声称，9·11事件是美国人咎由自取，甚至有人说，9·11事件是中央情报局干的等等，这些观点是被美国人所容忍的，但不是主流观点，也不能代表事实。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首先，为的是美国的安全。众所周知，美国怕死人，9·11一下死了将近3000人，美国人的观念一下发生了改变：美国并不安全。这个事件对美国人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人把9·11称为第二个“珍珠港事件”，这意味着美国进入到战争状态。恐怖分子成了美国当下最大的敌人，而萨达姆被看做是恐怖分子的庇护者和大规模杀伤武器

的拥有者，萨达姆政权无疑是美国安全的威胁者。2003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和警惕：“试想那19名劫机分子如携带其他武器，采取其他阴谋手段——这一次是萨达姆·侯赛因提供的武器装备。只要一个小瓶、一个罐子、一个箱子被偷偷带进美国，就可让我们经历从未有过的可怖的一天。所以我们将竭尽全力绝不让这样的情况出现。”

只有推翻萨达姆政权，才不会出现美国所忧虑的情况，这一点美国人毫不掩饰，布什赤裸裸地说：“美国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根本无须征得他人同意。”这也是美国绕开联合国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攻打伊拉克主要还是从自己国家的利益出发，但是，由于萨达姆政权本身是一个专制残暴的政权，美国出兵之举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推翻暴政、解放伊拉克的正义色彩，不过，美国的初衷是为了自己。

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人需要在大中东地区推广民主制度。中东是专制的堡垒，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专制。二战以来，推广民主价值观是美国长期的一项基本国策。罗斯福曾告诫美国人：“我们的自由取决于自由在其他国家的成功。”显然，经过二战的教训，美国人意识到，美国的自由无法通过“孤立主义”来捍卫，美国的自由必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否则就没有保证。在9·11后，美国则把本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是这样来认识本国安全和中东地区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的：中东地区“自由匮乏”的状况为仇恨信条提供了滋生的温床。当这个地区的公民无法通过开放的政治程序推进自己的利益和解决自己不满意的问题时，有人就会失去希望，退避到阴暗的角落，被怀有暴力企图的邪恶分子利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希望社会自动实现经济改革，使“自由匮乏”的现象自行消失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美国国务卿赖斯以“民主和平的前景”为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我们在这个新世界的历程使我们认识到，如今各类政权的根本性质比权力的国际分配更加重要。一味否认这一点是轻率和不切实际的。我们的国策旨在建设一个各国实行民主和自由的世界……促进自由是保障安全的唯一现实途径。”

所以，攻打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民主伊拉克，既是当下对基地组织的釜底抽薪之举，也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所必需的长远利益所在。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这场战争呢？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管美国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上的确是把伊拉克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了，就像伊拉克民主和人权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萨菲亚·塔勒布·苏海勒在谈到她的祖国时说的那样：“我们遭受萨达姆·侯赛因侵占长达35年。那才是真正的侵占。……感谢美国人民



付出的牺牲……特别要感谢各位军人。”

在谈及占领还是解放的问题时，意大利著名的新闻记者法拉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意大利人在 1945 年能够从墨索里尼手下解放出来，是因为盟军已占领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因为有了二战。没有那场战争，我们就一直得承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在二战中，盟军毫不留情地轰炸了我们；我们像蚊子一样地死亡。但在意大利，在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上，盟军也同样在阵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45806 名美军和 17500 名英军阵亡，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盟军；还有选择了戴高乐的法国人，还有选择了第五或第八军的意大利人。有谁能猜到在意大利有多少盟军的墓地吗？60 多个。最大、最拥挤的是美国军人的，在拿图诺，有 10950 个墓碑；在佛罗伦萨附近，有 5811 个。每一次我路过那里，看到那潮水般的十字架，我都因悲痛和感激而颤栗。”（《愤怒、自豪与怀疑》）

需要注意的是，二战时的意大利并未主动挑衅美国，战前没有跟美国直接冲突，这和伊拉克与美国尖锐对立的背景还不一样。如果我们接受法拉奇的观点，为什么不能接受苏海勒的看法呢？事实上，法拉奇之所以把“毫不留情地轰炸了我们”的美国人看做是解放者，并感激，是基于她内心的一种基本信念：人权高于主权。

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如果和平的前提是驯服、恐惧、失去尊严和自由，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杀。犹太人、库尔德人、科索沃阿族人被屠杀的经历就是证明。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人道主义的干涉具有正当性，我们不妨来复习一下历史。1933 年，当纳粹上台后，开始迫害犹太人时，罗斯福曾经进行过谴责，但被希特勒指为“干涉德国内政”。的确，德国犹太人是德国公民，如何对待，是德国的家务事，美国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就如同家长打自己的孩子，邻居无权干涉一样，这就是“主权高于人权”的逻辑。遗憾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盛行孤立主义，没有把干涉进行到底，客观上纵容了纳粹的种族迫害，造成了 20 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试想，当年美国有今天充当世界警察的意识，很可能大规模的迫害尚未开始，希特勒就已经被制止，甚至纳粹政权羽翼尚未丰满就可能被西方国家联手推翻了，哪里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

正是由于吸取了历史教训，所以战后，美国摆脱了自华盛顿以来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开始成为世界警察。说到世界警察，其实，二战后中国也是世界警察之一。

二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吗

“世界警察”一说出自二战末期。当时美国极力主张让中国取得大国的地位，罗斯福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因此，美国力主中国加入强国俱乐部，力挺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与美、苏、英共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议前夕，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代表莫洛托夫转达了魁北克会议中英国同意“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后，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罗斯福得知苏方的态度后，他指示赫尔，在会上要极力坚持四强观念，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宣言。赫尔坚持说：“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国政府认为，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在此建议不被苏联接受的情况下，赫尔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的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而且，如果苏方坚持拒绝邀请中国，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

在美国这种强硬态度下，苏联被迫改变了主张，赞成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但是，随后苏联又以中国在此无代表为借口，建议仍由苏、美、英三国签名。赫尔仍坚持必须由四国代表签字，并提出让中国驻苏大使代表签字。26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在会见赫尔后，立即电请蒋介石，授权他作为中国代表签字，27日蒋介石复电批准。30日，中国外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上签字。“四国宣言”的签订，迈出了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关键性一步。

后来，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于1943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苏联方面再次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中国无权列入。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中国，但它提出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罗斯福坚决不同意苏联的主张，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中国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

想一想，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毫无发言权，甚至山东还要被日本占领的情形，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中国在二战时发挥的作用比一战大，但毕竟是起牵制和配合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和美国、英国，如果没有美国力挺中国，中国可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吗？可能一跃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吗？

三 历史上中美关系一直不错

事实上，美国对我国的帮助远不止这些。有没有同学们去过南京？在南京有一个航空烈士公墓，里面有抗战时期 3000 多名航空烈士，其中，中国 870 名，苏联 236 名，美国 2186 名，韩国 2 名。在整个抗战期间，苏联空军击落日军飞机 986 架，而美国击落日军飞机 2200 架；抗战期间，苏联对华援助总额 2.5 亿美元，中方实际动支 1.7 亿美元，而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 6.2 亿美元的援助，成为了对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①。

众所周知，抗战是近代中国最接近亡国关头的一段历史，如果我们输了，中国历史就彻底改写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得到美国如此巨大的帮助，以至于大大影响了战争的胜负，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是，我们的教科书没有出现这些历史，甚至还让美国以帝国主义的形象出现，而美国居然不曾抗议，只能说明，美国是一个大度宽容的国家。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辛丑条约》，中国向美国赔偿 2444 万美元，美国方面退还了 1078 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这笔钱一部分用于创办清华的经费，每年约 60 万元；另一部分为留美学生经费，每年约 100 多万元。两项合计，约 200 万元。这个留学就是人们所说的“庚款留学”，它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顶尖的文化科技人才，他们是胡适、陈省身、华罗庚、梅贻琦、竺可桢、钱学森、杨振宁等，如果仔细搜寻，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明复（数学）、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等。

我们是如何理解庚款留学的呢？我们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他们试图扶植在中国的代理人。每当我看到和听到这样的言论时，就会产生深深的耻辱感，我为中国人的忘恩负义而感到羞耻，而我也是这个耻辱的群体中的一

^① 潘国琪、易继苍《抗战时期中美间五次借款》，《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2 年 01 期。